

强而无韧的秦王朝

——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



□ 冯敬飞

如同一个强壮的小伙子忽然身死，秦亡特别让人喟叹。《剑桥中国秦汉史》有一节《崩溃的原因》，归纳了秦亡的5个原因：一是残暴和剥削严重，二是秦始皇及二世不愿纳谏、子婴则软弱，三是没能吸取历史教训，四是陈胜、吴广起义，五是好大喜功。而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

从盛世看末世

这些年来，笔者专注中国历史王朝兴衰问题，全面梳理历史上43个盛世（含治世、中兴），着重探究15个中兴，剖析12个王朝的最后10年。这一系列看下来，有一个词逐渐浮现、加强，这就是“华丽转身”。

“华丽转身”是现代词，指从一种社会角色形象转变为另一种社会角色形象。转身是改变，华丽则强调这种改与变是朝着积极的、好的、公众认可或期望的方向。这华丽引申到政治，就是古人所谓“皇道开明”，现代所谓“文明执政”。对一个帝王来说，这才是关键。

历史上，不论中外，没有几个国家或王朝政权的取得来自和平。夺权之后的行动，才分出统治者的高下。有些帝王迅速华丽转身，尽量告别暴力，即使当时没有形成盛世，也打下了良好基础，二三代之后步入盛世。更多帝王迟迟不肯华丽转身，一根筋暴力下去，没亡在自己手里的，也坚持不了几代。汉光武帝刘秀、晋武帝司马炎、梁武帝萧衍、隋文帝杨坚、宋太祖赵胤胤、宋高宗赵构、明太祖朱元璋，都是开国即盛世。周成王、宋文帝刘义隆、齐武帝萧懿、唐太宗李世民、后唐明宗李嗣源、清圣祖康熙等，二三代才开创盛世。所谓中兴，南宋人王观国评价为“王道衰而能有复兴者”，从前辈那里接过来的就是“王道衰”的班底，再不华丽转身就来不及了。

“开元盛世”如日中兴，可就在这时爆发“安史之乱”。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分析：“安史之乱从根本上动摇了唐朝的统治根基，使得唐朝处于濒临灭亡的危机境地，然而在不知不觉中，唐王朝却又稳住了阵脚，竟然又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命脉。究其原因，应该说与蕴含在唐朝内部的柔性结构所具有的强韧性有关。”这种蕴含在王朝内部柔性结构的“强韧性”，就是盛世的结晶。有了这种“强韧性”，唐朝能够承受意外打击。而秦统一虽然迅猛，但由于没有“强韧性”，像钢一样，看似无比坚硬，但其实很脆，经得起高压，却经不起打击，一打就断。人算不如天算，百密一疏，意外防不胜防。韧性的强度，或者说有没有盛世、稳定发展期长短，决定一个王朝寿命的长短。

从暴君到明君

将一个人物简单标签化，很容易一叶障目。

面对春秋战国那礼崩乐坏、烽火连天的局势，许多有识之士挺身而出，所谓诸子百家，都在积极寻求解救之道，只不过多数人都失败了。秦始皇收拾了那么大的乱局，应该说功莫大焉。

统一之后，秦始皇仍然励精图治。《史记》载：“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当时文件刻在竹简上，一石约为现代30公斤。我们难以想象那一石文件相当于现在多少页A4纸，但不难想象每天过手过目30公斤物品是否轻松。

《中国历史大事编年》记载了始

皇帝的主要作为：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定官制、改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收民间兵器铸乐器，前220年西巡、筑国道，前219年东巡封禅、凿灵渠，前216年查核田亩，前215年伐匈奴，前214年击南越、筑长城。柏杨“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却破例赞秦始皇“做出了几乎比此后两千年大多数帝王所做的总和还要多的事”。

但这一系列大事，对于一个历经几百年战乱之后刚刚统一的国家来说，确实难以承受。史书描述其时“赭衣塞路，圜墙成市”，惨不忍睹。如果说伐匈奴、击南越、筑长城出于无奈，那么造宫殿和骊山墓可以暂缓吧？超出实际能力的事，就难免用暴力实施了。最糟的是“焚书坑儒”，虽然坑儒存在很多争议，但就像《剑桥中国秦汉史》所说，“它使后世的文人对秦帝国产生了持久的反感”。

然而，秦始皇显然也有华丽转身。他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所以从体制上挖掉了诸侯混战的根源。统一度量衡、凿灵渠都关系经济民生；收兵器铸乐器则极富象征意义。深入历史，还可以找到些耐人寻味的细节。秦始皇聘有70位学者，授以“博士”官衔；又为博士召2000多名学生，称“诸生”，并“尊赐甚厚”。这“博”与“诸”说明没什么独尊。2002年湖南龙山里耶出土的秦简表明：公元前214年被调派服役的12名犯罪男子，每日工资8钱，除去伙食费可余3/4，这并不太像“劳改”。公元前215年北巡时，秦始皇令李斯代撰《碣石门辞》，其中有句：“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即使这不是现实写照，至少表明秦始皇有这样的理想，与儒家所追求的并不矛盾。可见秦始皇不是不想华丽转身，只不过没转成功，或者说没来得及转成功，就被贴上“暴君”的标签了。

从恩人变敌人

直到秦始皇死，秦朝局势比此前此后许多政权变易之时看起来更平稳。公元前210年上半年，秦始皇东巡至云梦祭虞舜，到会稽山祭大禹，眺望南方战场，也许还想继续南下呢，哪有半点土崩瓦解的迹象？然而，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这种稳定并不是太平，它只是缄默而已。”

就在这时，秦始皇病倒，局势也随之如山而倒。大公子扶苏曾公然为儒生辩护，被逐边境督军，这是秦始皇犯的一个致命错误。但辞世前夕，秦始皇遗诏扶苏接班，说明他仍有转身之心。不想这重大时刻出了意外，大臣赵高与大将蒙恬之间有怨，赵高便篡改遗诏，赐扶苏与蒙恬死，而让另一个公子胡亥继位。至此，局势还不算最坏。胡亥少时跟赵高学法律，时年23岁。此时距陈胜揭竿而起还有整整一年时间，刘邦起兵更是在其后，胡亥仍有时间华丽转身。问题是胡亥根本没有此心。

在这里，姑且不抨击赵高、李斯之流，因为任何时候都有恶人。也不应抱怨六国后人复辟，给了你十几年时间，为什么还不能让他们“悦服”？如果没有陈胜带头，他们何曾有过反抗？关键是胡亥这不肖之子认贼为父，贪图享乐，像木偶一样任恶人摆布，一根筋错到死。当时起义军势如破竹，火烧眉毛，胡亥、赵高、李斯之流还在那里内耗，直到赵高杀了李斯，胡亥终于意识到危险，怒责赵高。赵高怕了，逼胡亥自杀，拥立其侄子婴。子婴不是傻瓜，赵高派人请子婴去受玺即位，子婴称病。赵高信以为真，前往探望，一进门便被杀。子婴也许不凡，但为时已晚。继位第46天，刘邦的军队即入咸阳。子婴不愿再连累百姓，放弃抵抗，向刘邦投降。强大无比的秦帝国仅存15年零47天。

说到底，还得追究秦始皇。由

于他没能及时华丽转身，虽然干了一堆大事，但人心尽失。想想拓跋濬当时，年仅12岁，能有多少大智大勇，还不是靠左右大臣？可是，秦始皇遗诏被篡改之时，为什么没有其他人站出来阻止赵高、李斯，使胡亥这个年轻人悬崖勒马？胡亥娱乐至死，继续横征暴敛修阿房宫，而将各地越来越猛烈的内战误以为鼠窃狗偷。直到战火烧到距咸阳仅30公里的戏水，胡亥才如梦初醒，慌忙救免骊山修墓的数十万刑徒，发给武器，鼓励他们拼死抵抗。这之前，那么多文官武将干什么去了？别忘了，陈胜、吴广门大都只是没经武装训练的农民，而官军十几年来曾横扫中原，军心民心都丢到哪里去了？

从折线转射线

如果将秦王朝的历史用线条描画出来，折线形最形象，上升线11年，下降线4年，顶端只有公元前210年一个点，飙升后如跳楼般坠落，如钢条戛然而断。

隋朝与之类似，但有所不同。581年杨坚受“禅让”开国立朝，结束南北朝乱局，随即华丽转身，被誉为“开皇之治”。604年杨坚去世，儿子杨广继位，说是弑父篡权，但没有影响大局稳定，完成大运河开发，完善科举制，拓展疆土，畅通“丝绸之路”，直到609年还一派升平景象。但随后发生突变，特别是征高丽陷入泥沼，老天爷又雪上加霜，山东、河南严重水灾，各地纷纷造反，仅文献确认的反叛组织就有200多个，官军根本应付不过来，直到618年被唐取代。609年是它的顶点。这说明仅有一个华丽转身的开国帝王还不够。刘彻曾为自己辩护：“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其实，历史上哪一个国家或者王朝不是“草创”？何况如范仲淹所说：“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即使盛世，也无不隐藏着或多或少的的问题。因此，即使开局转身得够华丽，也不可一劳永逸，还需要一个又一个的华丽转身，才可能形成足以抵御各种意外打击的“强韧性”。

汉唐宋明清与秦、隋等大不一样。唐朝前期有“贞观之治”“永徽之治”“武周之治”“开元盛世”，好比一节节火箭助推卫星升入太空，一口气兴盛137年。“安史之乱”后，相继有“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中兴”，又获得152年发展。明朝也如此，前期有“洪武之治”“永乐之治”“仁宣之治”，兴盛100余年，后期因为“弘治中兴”“隆庆之治”“万历中兴”又延续157年。如果画它们的历史轨迹，一个盛世就是一个波峰，整个王朝有数个波峰。将这些波峰的高点用曲线连起来，大致呈一个上升的弧线，如果把椭圆形圆心放置在一个坐标系的原点上，王朝上升的弧线就像第二象限中的弧线，大一些的王朝如同横放椭圆第二象限的弧线，小一些的如竖放椭圆第二象限的弧线，他们都绝不仅仅是一个折线。

谭宝信说历史上中国的疆界“像法国手风琴一样忽大忽小”，其实包括法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一样。在亚欧大陆的历史丛林里，除了古埃及、西罗马和东罗马、奥斯曼和汉唐等帝国那样的大树，多数时候的政权都是灌木或草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一样了。人类通过深刻反省，建立了一系列国际秩序与文明准则。从此，强国不能随意去灭一个穷弱小国。正是基于此，笔者畅想今后一个国家的历史轨迹可望由椭圆形变成“射线”。射线的特点是：一是只有一个端点和一个方向，二是不可度量。在世界相对和平的时代，只要保持执政定力，不断进取，完全可望让国家的历史在一个方向不可度量地、基本平稳地发展。

回顾秦亡的教训，就是要从前车之鉴中获取教训，更从中汲取力量，开创新的盛世。



□ 谢德新

“竹林七贤”是晋的一道风景，这道风景给颓丧的晋史抹上一丝亮色，名士、神交、风度、诞言、诗文为后世所神化，反传统、反礼教的怪诞举动从精神层面给人带来新奇，也给后人奉上带谜的探讨荒原。论竹林七贤的文章够多了，鲁迅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大概可称巅峰之作。他从好药嗜酒的微旨探义，给人印象极深。其实竹林七贤是个精神神交的团体，并不是一个同盟聚会的集团，常说竹林喻隐，这里好几位都是仕，且有的官当得还很大，如山涛、王戎。常说贤士放诞，几位官大的倒是战战兢兢，朝堂上循规蹈矩、长袖善舞，真正称上放诞的不过阮籍、嵇康、刘伶而已。除了嵇康见杀，其余几位都是寿终正寝，并无精神斗士的悲剧结局。“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作为名士的代表“竹林七贤”，七分之六竟然都是全者，倒值得提一提。

有趣的是，命运多舛的嵇康著有《养生论》，并从养性谈起，尚“气静神虚”，“越名教而任自然”，倡“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他和向秀，在门前大柳树下锻铁，许是“野蛮其筋骨”养生论的体力之行吧。至于服药嗜酒，乐此不疲，更可看成忘却凡尘的烦恼，崇拜一种醉而成仙、神游而成仙的飘飘然之举。率然任性，是神仙的境界，神仙是无拘无束的，故世间称快乐自由的人为“活神仙”，阮、嵇等人大约是想当活神仙的，从精神上到肉体上都有这种渴求。阮籍的青白眼示人是不与俗交，嵇康的深山采药流连忘返是亲身找神仙的体验，刘伶载酒车大醉，还让人身背锄头随地埋他，更是天马行空、无物无我、忘却生死的一种彻

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之所以撰写《淮南子》，既有学术目的，也有治国诉求。《淮南子》在政治上尤为重视统治者的“用人”问题，“观其所举，而治乱可见也”。

《淮南子》从治国重才、明于察人和用人有术等方面，阐发其“用人之道”，力求为西汉统治者提供一套卓有成效的用人方略。

观人用贤要重德扬长

《淮南子》认为，真正的贤才经常混迹于众人之中，并不容易被发现和赏识，因此统治者在治国上要想“求贤”以为己用，就必须具备知人之明，善于在凡众之中发现人才。《淮南子》指出，历史上的著名贤臣，如百里奚、伊尹、姜太公、宁戚，无一不是起身于卑贱“污辱”之中，在常人眼中都被视为“不肖”，但当其被秦穆公、商汤、周文王、齐桓公等英明君主擢识之后，最终都以自身的“大略”，成为一代贤相名臣。可见，对统治者来说，懂得如何“发现”人才，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统治者要慧眼识贤，就必须具有敏锐的政治见识，以及精当的观人之法。

对此，从实践着眼，《淮南子》向统治者提出几点建言：

观人论才要兼重德能，以德为先。优秀的人才才能“尽众益”，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其中尤以“仁”“智”为本，而且“仁”为贤才的内在品性，对贤才之“智”应发挥主导作用。

观人论才要善观明察，注重细节。贤才与“乱人”，智者与愚者，在现实政治中时常混杂一处，只看其表面现象，统治者很难有效区分。但是，那些英明有断的统治者，却能解决这种不利情况，因为

养生、养性和养命

底自由的放达。这些以自由为目标的怪诞举动大约正是应合了知识分子渴求自由的天性，故在竹林七贤身上点化光环，以浇心中块垒。

但魏晋的环境是不容你任性而为去养生、养性的，你还得考虑如何养命。嵇康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被杀了头，其余几位并不傻，你看王戎本来在齐王间面前说了句真话，遭朝臣谴责“议者可斩”，装着“药发堕厕”，方才免祸。从此，“与时舒卷，无蹇蹇之节”，“未尝进寒素”，“与时浮沉”。后来干脆在朝堂上人云亦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保身保命而已。这样，“虽无殊能”，官却越做越大，不管哪个王上，哪个王下，他却始终不倒，活到72岁，富贵长寿。山涛更为圆滑，并不因皇帝的信任恃宠而骄，隔一段便写辞职书，升了官便上拒绝疏，在真心退隐中，皇帝反而一再挽留，一再重用，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山涛的经历结局让人看到一个官场的柔段高手。那个与嵇康配合锻铁的向秀，在嵇康被杀后，似乎学聪明了，连忙去洛阳见司马昭，司马昭讥讽地说：你不是向来做许由那样的大隐士吗？到这里干什么？向秀乖巧地回答：许由不了解尧帝的心，不值得仰慕。这哪是隐者高士之言，简直是谄媚之言了。因此，向秀保住命，得善终。

嵇康死于钟会的谗言，我估计最主要的是司马昭早就讨厌嵇康的举动，钟会不过是揣摩透了司马昭的心思，从他讥笑向秀的言论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巧合的是，钟会在伐蜀前，与王戎也话过别，并向王戎讨教，王戎告诫：道家有言“为而



他们善于“观小节可以知大体矣”。为便于统治者的实际操作，《淮南子》还具体阐述察贤之法：“故论人之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施，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贫则观其所不取。”

观人论才要持公去同，举贤立功。要尽力避免以“同”取人，只注重选用那些合乎或顺从自己私欲的人，而忽视那些与自己不同好恶的真正人才，因为“忤于我，未必不合于人也；合于我，未必不非于俗也”。统治者只有从公心出发，不为私欲而扰，才能发现那些不同于凡庸，确有治国之能的人才。

治国之要在任贤用众

《淮南子》认为，统治者在治国上要用人有术，既能量才施用，循名责实，赏罚得当，也能汇集群才，积极用众，充分发挥人才的集体效应，为王朝政治的稳定发展，提供更好的政治辅助。

统治者在用人上应善于“因其资而用之”，能从人才自身的才能特点出发，顺其所长而用之。英明的统治者在用人上应力求扬长避短，合理发挥各种人才的特点。由此，《淮南子》指出，如果统治者在用人上做到“有一形者处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那么，“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则天下一齐，无由相过也，圣人兼而用之，故无弃才”。

《淮南子》明确提出，统治者在治国上需以“术”驭人，而这“术”就是“法律度量”，以及随之产生的赏罚手段。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主张统治者在用人上应该循名责实，赏罚分明。《淮南子》还特别指出：“明主之赏罚，非以为己也，以为国也；适于己而无功于国者，不施赏焉；逆于己便于国者，不加罚焉”“喜不以赏赐，怒不以罪诛”，要求统治者在用人

不恃”，非成功难，保之难也。果然，伐蜀成功的钟会也送了命，仿佛落了陷害嵇康的报应。

崇尚养生养性的嵇康本来是想无为的，无为偏有为，名气太大了，与曹魏集团的瓜藤枝蔓太多，本就命在旦夕，再加上少了一些其他几位养命的心思，想活，难矣。看来，像钟会这样的人，有奇世之才，却有小人的狭隘。来拜访嵇康，嵇康照样打他的铁，不理睬他，弄得钟会很没趣，只好讪讪走了，嵇康还要问上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也不客气气答：“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知养生养性的大名而来拜见，又知不识养命的个性有所盘算而去，钟会的潜台词或许如此。对嵇康来说，小人不恤，祸引自来，这与王戎对待钟会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王戎知养命，嵇康不知养命。

养性、养生，更多取决于主观的观照，这对渴求心灵自由的名士并不算难。养命更多的还取决于客观的环境，欲使自己的身心行为适应外界的环境，适应便得顺从，便有所牺牲，估计最大的牺牲莫过于管住心性的自由，这对想当名士的人便太难了。鱼与熊掌不能兼得，这便显出竹林七贤的层次来。作为士人心中放达自由的向往，在养命上失败悲剧的嵇康应当是令人尊敬的，即或是司马昭强权天下，杀嵇康时，还有“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从容而死前，一曲世间稀音广陵散，千古绝唱，感天地而泣鬼神。嵇康身上，大概才真正反映出后世知识分子赋予竹林七贤的精神风范，当然，他是以不会养命为代价的，可望者众，可及者寡。

《淮南子》提出的用人之道

□ 高旭

上所采取的赏罚手段，应该出于为国谋利的公心，而不是局限于自身的一己好恶。

“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虽幽野险涂，则无由惑矣”，《淮南子》在治国上尤为强调统治者要积极“用众”，能广聚群才，以为己用。《淮南子》深刻指出，统治者即使身处权力巅峰，不论其如何聪睿，终究为一己之能所限也，因此“专用其心，则独身不能保也”。基于此，《淮南子》主张“用百人之所能，则得百人之力，举千人之所爱，则得千人之心”，希望西汉统治者广开用人之途，得人心而尽众力，充分发挥人才的集体效应。

历史散叶